

目 录

1、难忘的经历，悲壮的战斗	3
2、回忆逮捕大恶霸吴我器的经过	8
3、我在广西参加南路讨蒋之役的回忆	9
4、回忆我跟滕代远同志干革命	12
5、三次去安乡送密件	18
6、忆四六年重庆同次“反苏”大游行	22
7、记蒋介石长中央大学前后片断	26
8、参加围歼腾冲日军纪事	30
9、解放前津市几次群众性罢工斗争	38
10、“常德会战”时日军进犯津市和撤退情况	47
11、回忆宋希濂来津和一封神秘的劝降信	51
12、抗日时期津市的“民训”	60
13、解放前津市发生的一次银行换币风潮	63
14、忆名画家孙海航先生	66
15、忆黄猫球队	72
16、解放前津市几次引人瞩目的治安事件	74
17、抗日时成立海员装卸部的一段纠葛	78
18、“迎解”工作点滴回忆	81
19、渡口古今谈	83
20、津市江西码头、义渡的起源	85
21、津市的当铺	87
22、津市西药话旧	87

23、禹禹三先生与灋东油厂	101
24、汪孔操先生事略	105
25、怀念我的父亲	107
26、回忆抗战时期我在三斗坪搞盐运	111
27、津市上海老同兴酱园	114
28、生财有道的鼎新书纸文具号	117
29、津市西药“药老虎”——刘长庚其人其事	121
30、津市的古墓葬	125

难忘的经历 悲壮的战斗

张 德

一九三〇年九月二十二日，驻在湖北洪湖苏区的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军军部突然接到命令：渡江出击，攻占岳州，切断粤汉路，配合中央红军一、三军团攻打长沙！

但是，当我们将过江的器材都一一准备好了时，根据国民党报载消息和红军侦察员的报告获知攻打长沙的红一、三军团已经退出长沙。到底还要不要渡江南征呢？在这个问题上，红二军团的领导人产生了严重的分歧意见。

在当时党中央负责人李立三同志“夺取中心城市”的“左倾”机会主义思想影响下，红二军团前委书记邓中夏同志说：“不管一、三军团退不退出长沙，我们还是决定南渡长江，进占津、澧”。周逸群同志则不同意这样办。他主张：以洪湖地区为基地，肃清苏区中的“白点”，扩大武装力量，巩固和发展湘鄂西革命根据地。但是，当时的主要负责人是邓中夏同志，他坚持渡江南征，以激起一、三军团再次反攻长沙。

十月十七日（或十八日），红二军团从石首监利一举渡过长江，分两路南征。一路是段德昌领导的六军攻打湖北的藕池，湖南的华容等地。红六军辖十六、十七两个师，打藕池的是许光达任师长的十七师。另一路是孙德清同志领导的红二军攻打南县，由红二军团的警卫团打先锋。在南县守敌湘西保安

部队向克土团的顽固抵抗下，警守团没有打进去，红二军遂速调四师十团担任主攻任务。十团是贺龙同志在湘西亲自培植起的一个团，战斗力非常强。因此，十团一上来就迅速攻下了南县，消灭了守敌向克土部敌军官兵过半。打南县，我亲自参加了，当时任红二军四师十团三连连长。

从十月二十二日起，红二、六军两部向公安县推进，先后攻占了藕池、官垱、公安等县、镇。拿下公安后，红二、六军会合在一座庙里召开了大会，并会餐。邓中夏同志讲了话。会后，决定兵分两路攻打津澧。一路由红六军第十七师的许光达率领，经盐井、张家厂直插津、澧。另一路由红二军第四师的王炳南率领，经黄山头、曹家场，至白洋堤集结；由红六军第十六师王一鸣率领的部队走焦圻、官垱、新洲，也至白洋堤，与红二军四师会合。十六师从公安向白洋堤进军之时，曾分出一部攻占了安乡，免除了攻打津澧的后顾之忧。安乡守敌是川军的二十二军两个旅，即张英的三十一旅（张英后升为十一师师长）和马瑩山的三十二旅（后驻守津市）。两军稍稍接触，川军便撤退，红军占了安乡。

一九三〇年十一月三日，二军四师和六军十六师分出一部监视白洋堤守敌，主力猛扑大堰垱、王家厂。然后又折转身来，打垮了防守在白洋堤一带的川军和湖南保安旅陈斗南的部队。我们打，敌人就跑。我们往下追，敌人就往澧县县城方向逃了。大概是下午三点钟左右开始打的吧，打了以后，我们就从小渡口进入了津市。

进津市后，有一部分溃敌撤到澧水南岸，我军在澧水北岸。两军隔河相持，常有军事冲突，还相互展开政治攻势，互相喊话、相互宣传，都听得清楚，就这样相持了几天。

占领津市后，我率领的四师十团第三连就驻扎在刘公桥附近的一座庙里。湘西的同乡、朋友、做裁缝的，摆摊作小生意的都跑来看我们。我们贴布告，搞宣传。宣传红军的纲领和共产党的主张。用红纸、绿纸、白纸写了好多好多的标语、口号，满街张贴。板壁上，墙上还用一种药用红土写上巨幅标语。对资本家我们实行没收政策，在农村我们打土豪。由此，从津市搞了不少的钱和物资，解决了吃穿的问题。

攻打津市时，红十七师也在攻打澧县。我们连在津市住了三天后，也去打澧县。结果，澧县城没有打开。于是，部队计划休整一个月。六军驻公安；二军打进石门，并就地休整，我们连住文庙。不久，敌十九师李觉和李国钧等部进逼新安、合口，其先头部队到达了石门的夹山寺。我军得知后，停止休整，在易家渡搭浮桥，从石门横渡澧水，我们连打前卫，我带领战士们抢占了一个山头，和敌人打了一天。敌人被击溃，我们占领了夹山寺。红军部队，大多都是从洪湖苏区游击队、赤卫队里挑选出来的优秀队员组成的。所以红军的战斗力很强，一个团可以消灭敌人一个团，就是子弹少了一些。

十二月，我红二军团又第二次攻打津澧，这时正值隆冬季节，下雪了。军团司令部就设在城西的云盘岗。当时的部署是：二军四师攻打澧县城的西门和南门，六军十六师打东门和北门。我们十团团部就设在澧城西边二里许的文良制，我连的机枪就架设离大西门不远的地方。十一团攻打小西门，十二团扎在河南岸。澧县城的守敌是陈斗南，还有从湘西过来的一部分敌人。敌人的武器远远优于红军，他们用武力胁迫一部分老百姓上城防守，在城墙上码满了砖块、石头和浸透了煤油或桐油的棉花包。晚上，每个城垛都点起了一盏盏耀如白昼的灯，

攻城前，我军备好了必要的攻城器械，如梯子、绳子、爆破工具等等。完成对敌的包围部署后，红军用没收地主的上好棺材四付，装填上炸药，分别于东门城外爆炸了三次，在西门城外炸了一次，终因城墙坚固和敌人的阻挠而未能奏效。

这次攻打澧县城，我红十团伤亡百余人，我连伤亡了二十多人。其中有被枪击的，被手榴弹炸的，被砖头石块砸的，还有被点燃的棉花包烧的……

损失最大的是留守在津市的红十七师五十团。他们遭到了张英、马望山两个旅从安乡、新洲、皇姑山的三路进攻。五十团不足二千人，敌人用迫击炮、重机枪打，战斗是很激烈的，红军五十团边打边退，死了很多人。五十团从津市退至澧县的十迴港，浮桥被敌人破坏了，指战员有的借用门板漂浮过河，有的不顾数九寒冬，干脆泅渡澧水，结果活下来的也就只剩下二百多人吧。

战斗结束后，我奉命带领三连全体指战员从澧县赶到十迴港的战场打捞和掩埋烈士的遗体。从战场的情况来看，五十团的红军都死得很英勇，很壮烈。一千多人前赴后继与敌人殊死搏斗，一个投降的都没有。津市到十迴港沿路都有红军的尸体，飘浮在河里的尸体也有好几百，天气很寒冷，打捞起来的红军尸体都结上了一层冰。由于处在战争环境，只好几个人一坑、二、三十人一坑，甚至于五、六十人一坑的就地掩埋。烈士的遗体是草草埋葬的，更谈不上开追悼会了。当时全国工农红军也不过十万人左右吧，像攻打津市的十迴港战役，五个小时内牺牲一千余人的情况，在红二方面军的战史上是少有的。

当然，川军也死得不少。川军素以“双枪将”的称号闻名全国，他们的官兵多抽大烟。我们捞起的川军尸体上，每个人

几乎都有一根“烟枪”或烟壶儿吊在裤带上。

我军打澧县城，整整打了八天八夜，还是没有打下。此时，敌十九师李觉从石门开过来，赖新恢率川军一部从安乡围堵过来，还有陶广的六十二师，陈渠珍的新编三十师等部都向津澧集结、合围。为避敌锋芒，我军便向湖北撤去，二军撤到公安一带，六军撤到松滋杨林寺一带。撤退的红军不料又遭到敌人的袭击。结果，红二军团原有的三万余人，由于南征中几次受挫，损失了一万多。损失最大的是红六军，后来，遂将六军所辖十六、十七两个师缩编为一个师，六军军长由汤慕禹接任，段德昌回洪湖苏区工作。

（田培生根据张德同志的回忆录和谈话记录整理）

回忆逮捕大恶霸吴我器的经过

袁 仁 远

一九二六年四月，我受湖南省委的派遣回慈利县工作，公开身份是国民党县党部筹备委员会主任。一九二七年初，由于革命形势的发展，农民运动的兴起，慈利各县都建立了农民协会，区长也大多换成了比较进步的人士，地主已不敢再象过去那样收租逼债，有些大地主吓得逃往外地，慈利县的大地主、大恶霸吴我器就躲藏在津市。一九二七年三月，莫和初和张玉琴两同志从长沙回慈利，路过津市，偶然发现吴我器躲藏在津市，遂与津市的党组织、津市总工会的党员负责人李立新（慈利人）联系，在津市党组织和工人纠察队的帮助下逮捕了吴我器，并将吴押送回慈利，我们组织了一个特别法庭，判处吴的死刑，立即执行，这下震动了全县。接着在群众的要求下，我们又逮捕了一批土豪劣绅，准备第二批镇压。但是还没有来得及公审，就发生了“马日事变”。从此，慈利县的革命斗争暂时转入了低潮。

（李林森根据袁仁远同志口述记录整理）

我在广西参加南路讨蒋之役的回忆

许 和 钧

一、桂系部队的分裂

一九二九年春，国民党桂系军阀在武汉因内哄而分裂，李宗仁、白崇禧等被其部下李明瑞、杨腾辉、吕焕炎、黄权等所打倒，李明瑞成了新桂系的领袖，伪装听蒋指挥，奉蒋任命为广西编遣特派员（即当时各省最高长官），于是李、杨、吕、黄等便将所有部队开回南宁、桂林、贵县……等地驻防，李明瑞即报蒋任其表兄俞作樵为广西省政府主席，并将当时中央军校南宁分校址改设“广西各部队干部训练所”，李白兼所长，以张云逸为总队长，姜丕承（即姜祖武，湖南慈利人，原在李任团长时，姜任李的团指导员）为干训所政治科长，实即李军的政治部主任，又任余绍，袁任远、许和钧、张秉琰等为干训所政治教官，轮调桂军各部排长以上中级干部受训。

二、南宁任职参加反蒋斗争

当我前在杭州被反动派逮捕系狱，初承国民党监察委员柳亚子先生打电报给浙江省府主席张静江先生保释出狱后，我便立即星夜趁沪杭铁路快车赴沪治伤，幸有好友张沈川同志每遇

我困难，总是慨然给予资助，彼时我想在沪既无生路，只有好

袁任远同志在南宁李明瑞同志部下工作，不知可否向南宁设法谋一吃饭之所，张就立时去电与袁，袁即回电要我去桂工作，我除任广西各部队干部训练所政治教官外，适姜丕承兼了讨蒋的广西省政府秘书长，他即要我兼任省府主任秘书，去代办接收手续，大约不到一个月，我因吐血失眠等病复发，有一次医生给我服了安眠药，姜丕承秘书长拍门喊我颇久，我才醒来，姜当即面达指示，说领导现有两个任务要我速办：一是我军现正分别联络冯玉祥为北路讨蒋军总司令，阎锡山为西路讨蒋军总司令，唐生智为东路讨蒋军总司令，陈调元为中路讨蒋军总司令，我军俞作柏为南路讨蒋军总司令，李明瑞为南路副总司令，经共同商定先由我们南路发动，向广东推进，他们四路就陆续响应出兵包围南京，来个第二次国民革命，我军就从第一次国民革命的老路，由粤经湘会师武汉、南京。因此，你明天就要召集干训所学员代表会商组织一个剧社，如同黄埔军校的血花剧社一样排演戏剧，举行军民联欢大会，因我军中还有一个团没有就范，必然会来参观演剧，事先我军作好准备，即将这一团包围缴械遣散，剧本尽量去买，如万一买不着，你就自己赶编一个剧本，我们另找地方戏班和各色艺术杂耍等轮番演出，以能演两天为好，我说我就编个《坚持就是胜利》的剧本，剧社名称就叫“星火”好了。

三、通电讨蒋不幸失败

姜继续说：交你第二任务，就是要你起草一个《讨蒋通电》的稿子，让大家考虑修改于最近发出，一面发电，一面就以吕焕炎为前敌总指挥，誓师向广东进发。我说：我明早一起

床就拟电稿送你，但须你们切实斟酌才行，几天后，我们开完军民联欢大会，翌晚我军正要下手，不料内部即行哗变，打了半夜的枪炮，逃出了一部分，余众自那并入我军，随着讨蒋通电一发，前敌总指挥吕焕炎即战败于广东陈济棠部香翰屏、余汉谋等师之手，而蒋又对其他各路“各个击破”，首先收买陈调元并对按兵未动的冯、阎、唐等施以威胁利诱，使东、西、北、中四路讨蒋部队，兵尚未出，即被瓦解，尤其是对吕焕炎，蒋更给以高官厚禄（广西省政府主席、薪饷械弹随吕所欲照给），而吕首先倒戈，以致不仅我们南路讨伐昙花一现，即其他各路均怀鬼胎，未战而止，成为历史上一大笑柄，使蒋更加骄傲自大，唯己独尊，目空一切，满以为蒋军为不可战胜的大军了。

四、李明瑞等部改编红七军

这样一来，李明瑞自己的部队被黄权拖走一部分，杨腾辉部亦附合吕焕炎部做官去了。李明瑞只得以仅存心腹警卫团及干部训练所的武装和部分杂军偕张云逸率队开往中越边境的龙州、百色……一带整编，改为红七军，由张云逸担任军长，于是李明瑞脱离李宗仁、白崇禧后讨蒋以失败告一段落。

回忆当李明瑞部计议讨蒋之初，我是主张他还驻在广西生聚教训，养精蓄锐数年，须俟羽毛丰满才可高举义旗，对蒋声罪致讨，胜利较有把握，同事多人也曾为事后的诸葛亮，与我同感，而当时，都迫不及待，竟在兵员不精不多，饷械不足，各路各部又不团结的情况下匆促出师，致遭失败，良深浩叹！

回忆我跟滕代远同志干革命

李 绍 林

我于一九〇四年十一月出生在湘潭县一个贫农家里，祖父给地主做短工和零工，父亲是农村的锯板匠。

一九一七年我十二岁时，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马列主义在全国各地传播开来。我家住湘潭市北面十五里九华庵兴隆桥，地处长潭公路上，交通方便，消息灵通。有一天我跟祖父到花雨山买米，他对我说，听说俄国已实行共产，人人平等，没有贫富，每个人都有田种，有工做，没有压迫，没有剥削。我听了印象很深，长期记在心里。一九一六年我到花雨山镇上学打铁，学了两年半，十五岁时，阴历八月，我父亲帮长沙一个资本家砍树被树压死了，人被压死，生活全无照顾，乡亲们长服气，去长沙讲理要安葬费，只给二十元纸币。没有办法只得卖掉家里东西去埋葬。父亲死后，家里生活更困难了，我就放弃了两年多的铁匠学徒去做长工，搞几块钱帮助养家。

穷人没饭吃，就要找出路，有的跑湖区的安乡、南县一带开荒种田，有的跑长沙帮工。一九二一年阴历七月间，我跟伯父迁到北门的新开河，租地一亩，自己种菜卖菜，有空还给人

家抬轿，帮地主做零工，有时当搬运工，摸鱼虾卖，为了挣到钱吃饭，什么事都去干。

一九二四年到一九二六年，正是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长沙街上来了很多北伐军，身背斗篷，上面写着“国民革命军”几个字，我想“革命”两个字一定是革命的，一定和俄国一样，这给我一线平等的希望，便想到革命军里当兵。但我一个人怕去的，就邀了好友王少林同去。王少林他在姜家做长工，我在姜家做短工，两人结成了好友，同去招兵报名处报名，没有名字怎么办？我照着王少林的名字取个李绍林，就这样参加了“新军”一个多月，大队伍开到湖北咸宁，没有赶上，一百多人就解散了。我们两只好回来，王少林回老家湘潭县，我回到了新河家里，那时正是秋收季节。

一九二六年十月间，湖南农民运动蓬勃兴起，我们乡里成立了农民协会，我很高兴地参加了农民协会，当了一名列察队员。当时长沙市郊成立了一百多个农民协会、按先后时间排列，我们乡排为第二十六个乡，我们东面的一个乡最后成立排为一百一十四乡。经过几个月的组织工作，将长沙周围的六十一个乡组成长沙郊区农民协会，区农协委员长是滕代远，其余的归各县去了。

一九二七年初，农民运动逐步发展，声势越来越大，农民上街游行示威，高喊“打倒土豪劣绅”、“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满街标语，到处大刀梭标，吓得在长沙的外国人纷纷逃到兵舰上溜走了，一时人心大快。

我们二十六乡的乡农协委员长是尹必端，他办事公道，群众拥护。纠察队长是郑秋浦，他是长沙大资本家朱金生的管家，因为他和他父亲是朱家抬轿出身，他老婆是朱家的一个丫

头，和周围的群众尚好，但到底还是朱家的管家，既管业又收租，不适宜当纠察队长。就计划培养新的骨干把他换掉下来。

为了加强农民运动的领导，一九二七年滕代远同志主办了一次纠察队员训练班，为期六个月，每乡抽一人，共有六十一人，地址在韭菜园一个外国人洋楼里。原正准备“五一”搞大游行的，突然发生了“马日事变”。那天我正在值班，听见外面枪响，及时向滕代远汇报，他当时认为不会有大的问题，可能是伤兵骚乱，急忙打电话联系，这时电话已经不通了，一刹时街上戒严，大小巷口被机枪封住了，即刻组织从后门撤退向东走，退到第一乡（现省委机关那里）住下，当天晚上在第一乡农协委员长家里开会，滕代远布置疏散回家，以后工作再通知。就这样我回到家里，正值耘秧时节，我帮姜家耘秧去了。

阴历六月间的一个晚上，滕代远同志到了尹必端家里，尹把他安排在后面小房里过了一夜。第二天，尹叫我过去一下，我到了他家，尹说滕委员长来了，他立即带我见了他一面。滕委员长交待我说，明天吃早饭后，到老三岔矾对河谷山里头一个庙里开会，这天晚上我送滕到河边过河。第二天约了五六个人去开会，我们到达时，会已经开过了，滕委员长还没有走，就向我们交待了以后的任务，把原来散在纠察队员手中的枪收集起来，送到岳麓山后面梅子滩（第一百乡）收藏，准备暴动时打长沙用。我们有四个人参加验枪工作，搞了一个多月收了三十多支枪。枪收完后，有一天要开会，滕代远就住在汤家粉场里，正要开会时有消息说，国民党军队过河西来了，滕急忙召集我们说：“最近形势不好，国民党力量大，我们

力量小，活动很困难，今天，会不开了，以后的事过几天再通知”。后来得知过河来的国民党兵是到裕湘纱厂那面去的。

到了阳历七月间，尹必端通知要到浏阳门的戩子桥开会，这次只有我和他两个人去，去时先到茶馆吃茶，天黑了便离开茶馆到山上一个庙里开会。这次任务是要到大托铺九六镇团防局缴枪去，据探听到那里有几十支枪。这是一场危险战斗，为了表决心，我们先开会喝雄鸡血酒。滕是第一个喝的，尹必端是第二个喝的，而我呢，是第三个喝的。血酒喝完，就宣誓，每个人发十支点燃了的香，宣誓后把香折断，表示下定决心、战斗到底，接着就排队出发。出发前滕把尹和我叫出来说，缴枪你们不去，另有任务。从安源山搞来四袋炸药，先找个房子存放，再做成炸弹，明天就派人去看房子，还要派一个会做炸弹的人一同做，我们不说二话，就把做炸弹的任务接下来了。当天晚上街上戒严不能回家，我们便在田边扮禾桶里坐到天亮，心里琢磨着任务接受下来了，怎么去完成呢？两个人商量了一会，做炸弹是危险的事，要想个合适地方。想了一大圈，没有好地方。我便说最好在我家里做。我分析道理说，我家左右有两户地主，我是地主家的长期短工，两家的儿子和我蛮好，称兄道弟的，人家不会怀疑我，尹同意了。天亮后回家，吃过早饭，就对伯父和哥哥讲做炸弹的事，他俩很支持我在家里做。过了不多时，尹必端带着滕代远派来姓刘的要看房子，看后就交待接运炸药的暗号，说到路局后门敲三下，就有人来接应的。接着老刘带我到北门外八角门楼福寿桥联络汇报，当时给我十二块光洋，交待六块买器材，六块作应急，两个人各拿三块，平时不用，到紧急时用。下午又采了一个刘兆升，他

会做炸弹。晚上我找来四个好友，都是码头工人，加上我和老尹同志把炸药搞回来，请来的四个人每人给二角钱作力资，这个钱是刘兆升付的。

刘兆升住在我家里，对外人说是我老表，在校读书生病，来我家养病的。要动手做炸弹了，首先到街上买器材，如铁皮筒做弹壳，药水棉花、硫酸、白糖、汽车灯泡、废铁丝、棉布等物资。铁皮筒子要到洋铁铺里定做，我借口装牛奶用的，这个东西做炸弹，人们没有见过就不怀疑。

做炸弹是件危险的事，先要经过试制，然而通过试炸，还要达到携带安全。弹壳是铁皮做的，弹药是矿山黄色炸药，用土法做炸弹，不能用雷管电爆，也不能用明火点引子，唯一的办法是化学变爆。秘密做炸弹没有试验场怎么办？就跑到十里外的洪山庙斗米塘山里试验，试炸声音很大，效果很好。试炸后，即刻跑回家。第二天老刘到现场观察回来说，炸痕有一斗田大，炸坑也很深。试炸成功了，就正式做起来，做了两个多月，共做了两百多个，其中有七个大炸包。炸弹做好交老尹送出去的，有部分是需要单位派人来运走的。

送炸弹，我也送过三次。第一次把炸弹放在四个大冬瓜肚里共装二十多个，送到北门外的指定地点被人接走的。第二次用同样方法送到北门外另外一个地点放下，被人接运走的。第三次是用排菜掩盖的，送到浏阳门北墙湾子任茂耀家里，是一个姓李的带路去的。送炸弹要两个人送，一个挑、一个带路，带路人像个大司务，手提篮子肩背秤，路上如遇国民党兵要强买，带路的说：“是我买的”，这样避免出事。

“马日事变”后，农民运动由公开转向秘密，斗争很激烈。我记得炸弹第一次是在教坪炸响的，那次是何键在那里

开民众进行反共宣传，一个炸弹把大会炸散了。第二次是在捞刀河炸铁桥，把铁桥炸坏了。第三次是在北门外毛家桥光华电灯公司里炸响的，是一个炸药包把锅炉炸坏了，炸后就关门了。这是一次大爆计划中炸的，原计划四个地方，有三个地方没有实现，如南门外电厂、电话局和电报局，因为“马日事变”敌人进行大逮捕、大屠杀，计划多被破坏了。

形势很紧急，有一天刘兆升上街听消息回来说，任茂耀被捕叛变了，各处联络点也破坏了，我就要走了，你也要走，因为你到任茂耀家送过炸弹，特别要注意啊！（刘兆升走后一直没有消息）。我听到后，当天晚上把未运走的炸弹搬到菜园里埋好，种上菜。过了几天，一天下午三、四点钟光景，我在门口看见对河来了几个警察，我就到后面菜园里观察动向，警察是那个姓李的带来的，先到刘八爷家问我住在哪里，刘八爷的老婆指着我家说，“住那里”，警察转了一个圈，来到我家，我忙向黄豆田跑，因黄豆禾高，没找到我，见到我的小舅子说：“你是他的儿子吗？旁边人说：他没有结婚那里来的儿子，后来找到我母亲说：“你是他的老婆吗？……，从这些情节看来，敌人不知道我有多大年纪，什么样子的人，关系没搞清，没有找到人。

我走后埋在菜园的炸弹尹必端运走了，我在老家住了一年多，一九二八年年底来到津市，大年初一，我才回家过新年。过了新年就迁到津市定居了，首先在天一烟号（后来改为同康）做炊事员和杂工。帮工十八年，到一九四六年转到“津市高农”当炊事员，一九四八年下半年在学校参加了党的地下组织。